

信奉阴谋论的动机及干预手段

茆家焱¹, 杨沈龙², 郭永玉¹

(1.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 210097;2.西安交通大学
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所,西安 710049)

【摘要】 在心理学的研究视角下,个体的阴谋论心态被定义为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事件视为有权力的组织或个人暗中蓄意预谋以达成其预定目的的解释倾向。而人们产生这种心态并选择信奉阴谋论可以通过认知动机、存在动机或群体动机来解释。基于这三种动机,提供反阴谋论证据、发展分析性思维及重视认知理性、缓解焦虑及提升控制感、对重要他人进行认知介入等手段可以有效干预阴谋论。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结合中国社会文化背景,选用更具特殊意义的样本,更多通过因果逻辑实验,加强干预研究的开展。

【关键词】 阴谋论; 动机; 干预; 控制感; 分析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9.03.040

Motives of Believing in Conspiracy Theory and Means of Intervention

MAO Jia-yan¹, YANG Shen-long², GUO Yong-yu¹

¹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²Institute of Social Psych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the individual's conspiracy mentality is defined as the tendency to interpret major social and political events as powerful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who secretly and deliberately plan to achieve their intended purpose. The generation of this kind of mentality and people's choice to embrace conspiracy theories may be explained by cognitive motives, existential motives, or group motives. Based on these three motives, providing anti-conspiracy evidence, developing analytic thinking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epistemic rationality, relieving anxiety and improving perceived control, and cognitive infiltration of important others can effectively intervene in conspiracy theories. Future research can consider combining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selecting more specific samples, conducting more causal logic experimen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vention research.

【Key words】 Conspiracy theory; Motives; Intervention; Perceived control; Analytic thinking

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是一种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事件归因为由强大且恶意的群体或组织密谋实施的说法^[1-4]。同时,“阴谋论”不同于已经被证实的“阴谋”,它所涉及的事件背后可能隐藏着阴谋,只是这些阴谋至今未被发现^[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阴谋论”是对有可能发生但尚未被证实的“阴谋”的一种解释说法。因此,有国内研究者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将人们这种“阴谋论”的心态或信念定义为:一种将某些历史或当代事件视为有权力的组织或个人暗中蓄意预谋以达成其预定目的的解释倾向^[6]。心理学对这种“阴谋论”的心态或信念进行研究主要通过测量“阴谋论信念”(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尽管在不同量表中的命名不同,但实质相同)来实现。

已有的研究发现,相信一种阴谋论的人也有可能相信其他的阴谋论^[2,3,7],即使这两种阴谋论是相互矛盾的^[8,9]。不仅如此,在今天这个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阴谋论并没有因为信息的通畅而减少,反而变得越来越流行^[10];加之阴谋论背后的事实真相往往没有个人的情绪和信仰重要^[1],借助社交媒体的覆盖范围和传播速度,阴谋论可以迅速误导民众,

从而使一些不为人知的群体获益。民众的过度信奉以及这种阴谋论心态的蔓延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了解人们相信阴谋论的动机,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心理干预,是当前和未来阴谋论研究领域的重点关切。

1 信奉阴谋论的动机

从动机的角度来看,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有时甚至是在不确定的证据面前^[11]。这和普遍的观点:人们的信念是由于或多或少地合理使用了证据相违背,因为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信念和观点往往来自于有偏向的、选择性的和带有动机的信息处理^[12]。

1.1 认知动机

人们想要理解世界,就会在认知上产生一种努力减少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动机。这种认知动机引发人们信奉阴谋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当人们感到不确定时,阴谋论信念会更加强烈^[13];当个体认知闭合的需求(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高时,更倾向于相信阴谋论^[14,15]。这是因为,阴谋论提供了一种广泛而一致的解释,让人们能够在不确定和矛盾的情况下保持自己的信念^[16],或者通过阴谋论的简单解释来帮助自己理解外部世界,减少认知上的不确定性。而阴谋论的一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190029)
通讯作者:郭永玉, E-mail: ygyuo@njnu.edu.cn

个相关性质就是,人们可以通过将绝大多数不确定的证据(如科学发现)作为阴谋的产物来保护自己重视的信念^[17]。例如:认为全球变暖不是一个严重问题的人,当接收到关于全球变暖的信息时会感到不确定,在认知动机的影响下会更倾向于把“全球变暖”当作是科学家与政府之间的阴谋。

Prooijen 和 Jostmann^[13]通过实验操纵被试认知上的不确定性,结果发现,当被试接收到关于石油公司的道德或不道德行为的信息后,只有感知到不确定性显著的个体,其认为石油公司推动引发了伊拉克战争的阴谋论信念更高。同样,无论一个虚构的非洲国家道德水平高还是低,只有在认知上被操纵经历了不确定性的被试才更倾向于将这个国家中一位预计将赢得选举的领导人的车祸归因为阴谋论。这说明,简单的道德水平判断不足以令民众信奉阴谋论,而对外部世界感到不确定时,在认知动机的作用下,民众才会相信阴谋论。也有不少研究探究了认知闭合需求和阴谋论之间的联系^[14,15]。在实验操纵下,认知闭合需求水平高的被试更倾向于将虚构的“某国总统在飞机坠毁事故中丧生”这一事件归因为阴谋论^[14],这说明认知闭合的需求会影响个体对外部事件的认知,并使个体主动忽视寻求证据,而采用阴谋论来满足认知上的确定性。

1.2 存在动机

存在动机源于人们努力避免外部世界存在的威胁,并且感知一种安全、安心和可控的环境^[18,19]。基于这种存在动机,人们选择信奉阴谋论主要表现在:当个体感觉自身受到威胁,无法控制结果^[20],以及感到焦虑^[21]和感到无能为力^[22]时,信奉阴谋论有助于个体减少感知到的威胁,提升控制感和安全感,建立外部世界的秩序。

研究发现,有过被排斥经历的人们^[23],因为收入而产生客观上较低(相比于较高)地位的群体成员以及在政治进程上失败(相比于成功)的一方^[4]更倾向于相信和支持阴谋论。这是因为他们都感知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借助阴谋论来解释这种威胁,从而感到更安心。并且,由于外部威胁会使人丧失控制感,实验表明,当被试的控制感降低时,他们的阴谋论信念就会升高^[20]。这是因为当个体丧失控制感后,会为了了解事件背后的真相而选择笃信阴谋论的说法,作为一种信念层面的补偿控制途径^[24],重获控制感,避免外部威胁。虽然阴谋论不一定是对外部事件真实的解释,但阴谋论却能及时满足个体建立秩序的需求,而补偿性控制理论(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将个体这种寻求建立外部世界秩序的需求解释为结构需求(need for structure),当个体的结构需求被满足时,其控制感也会上升,感知到外部世界的威胁会被削弱或消除^[25],从而感到外部环境有序、安全。因此,越是想建立秩序的个体,越支持阴谋论的观点^[26]。

此外,人们在感到焦虑和不安全时会信奉阴谋论。Freeman 和 Bentall^[27]报告了不安全依恋和阴谋论信念之间存在正相关。Green 和 Douglas^[3]通过实验,在考虑到其他的预测因素,并对比了安全依恋(secure attachment)和回避依恋(avoidant attachment)后明确指出焦虑依恋(anxious attachment)是预

测阴谋论信念的关键因素。具体地说,当个体的安全感受到威胁(例如恐怖主义袭击)时,个体就会产生上述的存在动机^[28],高焦虑的个体更倾向于夸大自己面临的威胁,表达自己的弱点来吸引他人的注意^[3],从而获得帮助,缓解自身的焦虑,感到更加安全,而此时,阴谋论恰恰成为了夸大威胁的一种策略。

总之,当人们受到外部世界带来的威胁时,将阴谋论作为一种因果解释有助于人们在环境中感到安全,同时作为独立的个体和集体中的成员对环境进行控制^[16]。因此,阴谋论成为了人们的一种尝试性的防御机制来满足心理上对安全和控制的存在需求。

1.3 群体动机

人们意识形态上的信念会受到建立和维护与他人共同世界观以及维护内群体正面形象的群体动机的影响,无论这个信念是保守的还是进步的,甚至是错误的^[18]。出于这种群体动机而选择信奉阴谋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更注重和群体中其他成员保持联系的人(如保守派或右翼)更倾向于支持和分享阴谋论,因为他们更渴望与志同道合的人“共享现实”,更可能维持自己单一的社交关系网络^[29];二是当人们发现自己所在群体的正面形象受到威胁时,更可能相信阴谋论,因为阴谋论可以通过将内群体的负面结果归咎于他人,从而维护内群体更有能力和更有道德的正面形象^[16]。

Sunstein 和 Vermeule^[30]在阐释阴谋论产生和传播的机制时提出,当一个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某种阴谋论时,原本不相信该阴谋论的人迫于群体和信息压力也会接受这个阴谋论。这是因为当信息有限时,人们出于群体动机会更倾向于基于他人的信息,接受他人的想法。同时,当重要他人(如长辈、群体的领袖等)持有阴谋论时,来自他们声誉的压力会让人们保持沉默、压制怀疑甚至试图讨好、共享他们的观点,因为人们不想面对敌意或者失去好感。“群体极化”现象也反映了这种群体动机,那些不赞同美国并怀疑其意图的人,如果他们交换了观点,将会增加他们对美国的反对和怀疑^[30,31]。

出于维护内群体正面形象的群体动机,自恋的个体或集体更倾向于相信阴谋论。集体中的成员可能出于强烈的集体意识,并且受到偏执想法的影响,会将阴谋论作为一种防御手段让集体从不利的位臵或责任中解脱出来^[16,32]。Cichocka 等人^[32]通过实验证明,集体自恋可以显著预测关于外群体成员(如外国政府)的阴谋论的支持。例如,波兰民族的集体自恋预测了对犹太人企图统治世界的阴谋的刻板印象^[33];同样的,美国的集体自恋预测了除美国政府外对涉及外国政府的阴谋论的支持^[34]。

2 基于动机的阴谋论干预研究

大量研究发现,阴谋论可能是有危害的^[35-37]。阴谋论不仅会对人们在卫生健康、环保态度和政治参与等个人层面问题的决定上产生消极影响^[35,38,39],还可能导致民众不支持现有的社会系统,甚至采取行动挑战现状^[9],使得社会系统不稳定。更重要的是,这些阴谋论信念一旦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中

将很难扭转^[38]。因此,基于上述人们信奉阴谋论的三种动机,研究者提出以下几种具有针对性的阴谋论干预手段。

2.1 合理化认知——基于认知动机的干预

当人们产生减少外部世界不确定性和认知闭合需求这样的认知动机时,人们会主动放弃寻求事件背后的真相而简单地选择相信阴谋论。这种对外部事件片面的归因是一种不合理的认知,可以通过提供反阴谋论证据、提高认知能力和重视认知理性等手段来合理化认知,从而干预阴谋论。

2.1.1 反阴谋论 提供反阴谋论的证据或信息是干预阴谋论最直接的手段,能够从认知上满足个体对外部事件确定性的需要。Banas和Miller^[40]针对911事件的阴谋论进行了研究。他们要求被试观看关于911真相运动的阴谋论影片,然后再给被试呈现了两种反阴谋论的证据,一种是基于事实上的反阴谋论证据(例如:影片中并没有提供爆炸物的证据),一种是基于逻辑上的反阴谋论证据(例如:该理论缺乏简约性),最后测量被试对美国政府参与了911袭击的阴谋论信念。结果显示,相比于控制组,两种实验条件下都降低了被试的阴谋论信念,并且基于事实的论证比基于逻辑的论证更加有效^[40]。该结果表明,基于事实的反阴谋论可能是一种有效减少阴谋论信念的途径^[37]。

然而,也有研究者指出,提供反阴谋论并对阴谋论进行纠正,可能会使阴谋论者产生极大的抵触,因为相反的证据通常会被理解为阴谋论的一部分^[39]。于是,Jolley和Douglas^[38]提出,在阴谋论产生之前就提出反阴谋论证据可以加强反阴谋论说服力,因为首先呈现的有争议和有趣的信息往往会产生首因效应。

以反对疫苗接种的阴谋论为例,该说法认为,制药公司和政府为了能够从中获利,伪造了与疫苗接种相关的数据,并且对公众刻意隐瞒了疫苗的有害副作用。甚至疫苗会引起自闭症这样的说法在美国很流行^[41]。接受这种阴谋论的人们所感知到的疫苗危险性增加,从而不愿意为一个虚构的儿童接种疫苗^[37,38]。现有的改善人们疫苗接种意愿的方法是直接提供反阴谋论的信息和证据:请专家来说服公众,并强调疫苗接种的规范性和安全性。Jolley和Douglas^[38]通过在将被试暴露于有关疫苗接种的阴谋论之前和之后给被试呈现反阴谋论的信息,结果发现,虽然阴谋论会削弱被试为一个虚构的儿童接种疫苗的意图,但在阴谋论之前呈现反阴谋论信息可以减少这种负面效应。这表明,在阴谋论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之前进行科学教育的干预措施是有效地改善疫苗接种意愿的一种途径;但在阴谋论信念确立后,则需要更加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例如,美国俄勒冈州近年就通过立法,要求所有希望免去疫苗接种的家长或监护人接受关于接种疫苗的益处和风险的教育。

2.1.2 认知能力和认知理性 鉴于阴谋论常常使用到反事实的论证(例如:循环推理、重复未证实的前提错误、不可证伪性和逻辑缺陷等),同时,从事分析性思维工作的人不太可能持有特定的宗教和超自然信念^[42,43],提高民众的认知能力理论上可以减少其对外部事件进行简单、片面的阴谋论归因。Swami等人^[44]通过实验发现了阴谋论信念和分析性思维

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启动分析性思维的实验操纵可以减少阴谋论信念,包括一般阴谋论信念和关于伦敦7/7爆炸事件的具体阴谋论信念。这可能是因为分析性思维促使个体对信息仔细而有意识地处理,从而增加了对大多数阴谋论中固有的逻辑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关注^[44]。因此,政府通过普及教育等手段支持分析性思维技能的发展也是干预阴谋论的一种有效途径。

但有研究者提出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其认知能力(分析性思维)水平也显著地提高,为什么阴谋论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普遍存在?Stahl等人^[10]认为人们认知能力的提升还不足以干预阴谋论,人们还必须重视认知理性(epistemic rationality)。这里的认知理性可以理解为基于逻辑和证据形成信念的动机,因此,认知能力和认知理性对个体怀疑阴谋论产生了交互影响。也就是说,针对认知理性的干预也可能是增加对阴谋论怀疑态度的可行途径。但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使人们致力于利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去追求真相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2 缓解焦虑及提升控制感——基于存在动机的干预

当某些政治或社会事件(如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等)突然爆发时,民众会迅速感受到来自这些外部事件的威胁,感到恐慌、焦虑,自身的控制感和安全感也会下降。出于避免威胁、建立秩序、补偿控制感等存在动机,民众会信奉阴谋论。因此,从理论上来说,缓解个体的焦虑情绪及提升个体控制感可有效干预阴谋论。

从缓解个体焦虑的角度出发,Green和Douglas^[3]提出,启动人们的安全性依恋可以有效减少人们的阴谋论信念。这是因为依恋系统是心理安全感的基础,当遇到威胁时,启动安全性依恋的个体相信自己拥有他人的支持与关怀^[45],从而缓解了焦虑情绪,提升个体安全感,避免了外部威胁,阴谋论信念也随之降低。当然,除了启动安全性依恋来缓解焦虑以外,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其他缓解焦虑的手段是否可以干预阴谋论,以及如何将包括启动安全性依恋在内的种种干预手段应用于现实社会。

从提升控制感的角度出发,Prooijen和Acker^[20]通过研究提出,控制感和阴谋论信念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不仅当个体的控制感丧失时阴谋论信念会升高,当个体的控制感提升时其阴谋论信念也会降低,这也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明确了提升控制感来干预阴谋论的有效性。再将眼光置于企业组织中,每当有金融危机等事件爆发时,组织阴谋论(organizational conspiracy theories)往往也会随之而来,并对员工、管理层乃至整个企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Prooijen和Vries^[46]为组织阴谋论提供了多种干预手段,其中之一在决策过程中认真执行程序正义原则,例如让员工对相关决策发表意见可以改善他们与决策者的关系,并为他们提供自主感^[47]。执行程序正义、提供自主感也是变相提高员工控制感的有效途径。

2.3 对重要他人的认知介入——基于群体动机的干预

由于人们出于群体动机会倾向于相信群体中其他成员

所信奉的阴谋论,特别是当地位和声誉比自己高的人相信某种阴谋论时,人们甚至会压制自己的怀疑而主动分享他们的观点,因此针对这样的群体动机,最有效的一种干预途径是对群体进行认知介入(cognitive infiltration),特别是对极端的阴谋论群体和群体中的重要他人进行认知介入。

Sunstein 和 Vermeule^[30]提出,当网络和现实中的群体产生越来越极端的阴谋论时,政府可以通过引入认知多样性对其进行认知介入,从而实现从阴谋论的抑制甚至扭转。具体而言,政府的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员)可以匿名或实名进入网络社交聊天平台甚至现实生活中的阴谋论群体,并试图引起人们对阴谋论的实际前提、因果逻辑和对政治行为影响的怀疑,从而破坏阴谋论思想的传播。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重要他人,比如极端阴谋论群体中的“头目”进行认知介入,当这些人扭转思想后,普通信众的态度将更易于转变。不过,这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引发阴谋论群体对政府更大的怀疑;政府工作人员自己可能会被阴谋论观点所说服;甚至工作人员会被极端的阴谋论者揭发和伤害。

此外,如果阴谋论是出现在企业组织中,Prooijen 和 Vries^[46]还为组织阴谋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教育员工了解竞争市场中管理决策的复杂性,并全面告知员工为什么做出某些决定,尤其是要告知那些从组织长远的集体利益出发但会牺牲其个人利益的特定员工,以及这部分员工群体中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员工。这其实也是对群体中的重要他人进行认知介入的一种具体表现。

3 小结与展望

国外对阴谋论的心理学研究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国内的阴谋论心理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同时,中国社会近年来的阴谋论也层出不穷,甚至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并且,这些阴谋论观点一旦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人们的这些观念将很难被改变^[38]。所以,无论是阴谋论的产生机制、影响后效还是干预手段,都应该引起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

此外,前人对阴谋论的研究也多为相关研究,缺乏因果分析^[10,35,46]。例如:上文提出的认知、存在和群体动机会导致人们相信阴谋论,其中有不少是源于理论的推断和相关研究的证据,研究者本人也认为,未来仍需要大量的实验研究来证明阴谋论能够满足人们的这些动机^[16]。此外,关于阴谋论干预的研究,虽然已有证据表明提高认知能力和重视认知理性能够对怀疑阴谋论产生影响,但前人的实验设计却不能得出因果关系的结论^[10]。未来重视因果分析的研究可以得出关于阴谋论的更为充分的研究成果。

其次,前人的研究样本不够全面。例如:在上述的动机层面,尽管有理由相信阴谋论源于认知、存在和群体动机,但前人的研究主要从学生样本和普通民众中取样,很少涉及那些被社会疏远或真正受到威胁的人群(出现极端阴谋论者比例较高的群体),而这类人群高度反社会和愤世嫉俗的动机似乎更容易导致阴谋论的产生^[16],由此可见,阴谋论的产生机制是复杂的,值得进一步的探索。

最后,应加强干预研究。阴谋论会产生诸多弊端已成为研究共识,目前心理学上针对阴谋论应对策略的研究还比较少,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呼吁未来要对阴谋论的干预多加重视^[3]。而仅就已有的研究来看,其干预手段仍然比较局限:事先提供反阴谋论证据仅适用于预防部分类型的阴谋论;启动安全性依恋的干预手段仍停留在理论阶段;提高控制感和认知能力、重视认知理性的现实操作难度较大,其效果也有待检验;对重要他人的认知介入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也许应对不同类型的阴谋论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或者多种干预手段并行,但在这方面,心理学的研究还必须继续深入下去。

参 考 文 献

- 1 Douglas KM, Ang CS, Deravi F. Farewell to truth?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fake news on social media. *Psychologist*, 2017, 30: 36-42
- 2 Goertzel T.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1994, 15(4): 731-742
- 3 Green R, Douglas KM. Anxious attachment and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8, 125: 30-37
- 4 Uscinski JE, Parent J. *American Conspiracy Theorie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5 Coady D. *Conspiracy theories: the philosophical debate*. Farnham, UK: Ashgate, 2006
- 6 白洁, 郭永玉, 徐步霄, 等. 阴谋论的心理学探索. *心理科学*, 2017, 40(2): 505-511
- 7 Swami V, Chamorro-Premuzic T, Furnham A. Unanswered question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predictors of 9/11 conspiracist belief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010, 24(6): 749-761
- 8 Wood MJ, Douglas KM, Sutton RM. Dead and alive: Beliefs in contradictory conspiracy theor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 Personality Science*, 2012, 3(6): 767-773
- 9 Imhoff R, Bruder M. Speaking (Un-)Truth to Power: Conspiracy Mentality as a Generalised Political Attitude.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14, 28(1): 25-43
- 10 Ståhl T, van Prooijen JW. Epistemic rationality: Skepticism toward unfounded beliefs requires sufficient cognitive ability and motivation to be rational.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8, 122: 155-163
- 11 Pomerantz EM, Chaiken S, Tordesillas RS. Attitude strength and resistance proces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9(3): 408-419
- 12 Greenwald AG. The totalitarian ego: Fabrication and revision of personal hist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0, 35(7): 603-618
- 13 van Prooijen JW, Jostmann NB.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The influence of uncertainty and perceived morality. *Europ-*

- 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3, 43(1): 109–115
- 14 Leman PJ, Marco C. Beliefs in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the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3, 4(4): 378
- 15 Marchlewska M, Cichočka A, Kossowska M. Addicted to answers: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and the endorsement of conspiracy belief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7, 48: 109–117
- 16 Douglas K, Sutton RM, Cichočka A. The Psycholog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7, 26(6): 538–542
- 17 Lewandowsky S, Oberauer K, Gignac GE. NASA faked the moon landing—therefore, (climate) science is a hoax: An anatomy of the motivated rejection of sci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 24(5): 622–633
- 18 Jost JT, Ledgerwood A, Hardin CD. Shared Reality,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Relational Basis of Ideological Beliefs. *Social &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08, 2(1): 171–186
- 19 Jost JT, Hunyady O.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ystem-Justifying Ideolog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5, 14(5): 260–265
- 20 van Prooijen JW, Acker M. The influence of control on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Conceptual and applied extension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015, 29(5): 753–761
- 21 Grzesiak-Feldman M. The Effect of High-Anxiety Situations on Conspiracy Thinking. *Current Psychology*, 2013, 32(1): 100–118
- 22 Abalakina-Paap M, Stephan WG, Craig T, et al. Beliefs in Conspirac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1999, 20(3): 637–647
- 23 Graeupner D, Coman A. The dark side of meaning-making: How social exclusion leads to superstitious think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6, 69: 218–222
- 24 白洁, 郭永玉, 杨沈龙. 人在丧失控制感后会如何?——来自补偿性控制理论的揭示.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 25(5): 982–985, 981
- 25 王艳丽, 郭永玉, 杨沈龙. 家庭社会阶层与其结构需求的关系: 补偿性控制理论视角.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 25(2): 371–373
- 26 van Prooijen JW, Dijk EV. When consequence size predicts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spective tak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4, 55: 63–73
- 27 Freeman D, Bentall RP. The concomitants of conspiracy concerns. *Social Psychiatry &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17, 52(5): 595–604
- 28 Mikulincer M, Shaver PR. The Attachment Behavioral System In Adulthood: Activation, Psychodynamics,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3, 35(3): 53–152
- 29 Jost JT, Costas SVDL, Curtis P, et al. Ideological asymmetries in conformity, desire for shared reality, and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18, 23(2): 77–83
- 30 Sunstein CR, Vermeule A. Conspiracy Theories: Causes and C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2009, 17(2): 202–227
- 31 Sunstein C.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Other Dangerous Ideas*.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2014
- 32 Cichočka A, Marchlewska M, Agnieszka GDZ. Does self-love or self-hate predict conspiracy beliefs? Narcissism, self-esteem, and the endorsement of conspiracy theor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 Personality Science*, 2016, 7(2): 34–37
- 33 Agnieszka GDZ, Cichočka A. “Collective narcissism and anti-Semitism in Poland”: Corrigenda.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012, 15(2): 213–229
- 34 Cichočka A, Marchlewska M, Agnieszka GDZ, et al. ‘They will not control us’: Ingroup positivity and belief in intergroup conspi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6, 107(3): 556–576
- 35 Jolley D, Douglas KM.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onspiracism: Exposure to conspiracy theories decreases intentions to engage in politics and to reduce one’s carbon footprint.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4, 105(1): 35–56
- 36 Douglas KM, Leite AC. Suspicion in the workplace: Organizational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work-related outcomes. *Br J Psychol*, 2017, 108(3): 486–506
- 37 Jolley D, Douglas KM. The effects of anti-vaccine conspiracy theories on vaccination intentions. *Plos One*, 2014, 9(2): e89177
- 38 Jolley D, Douglas KM.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 Addressing anti-vaccine conspiracy theori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7, 47(8): 459–469
- 39 Bogart LM, Thorburn S. Relationship of African Americans’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o belief in conspiracies about HIV/AIDS and birth control.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2006, 98(7): 1144–1150
- 40 Banas JA, Miller G. Inducing Resistance to Conspiracy Theory Propaganda: Testing Inoculation and Metainoculation Strategie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3, 39(2): 184–207
- 41 Oliver JE, Wood T. Medical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health behavi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Jama Intern Med*, 2014, 174(5): 817–818
- 42 Gervais WM, Norenzayan A. Analytic thinking promotes religious disbelief. *Science*, 2012, 336(6080): 493–496

- incentive plans, A's, praise, and other bribes.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1999
- 8 姚计海, 张彩云. 美国学校的“零容忍”惩罚政策述评与反思. 外国教育研究, 2003, 12: 31-34
- 9 Baumrind D. The discipline controversy revisited. Family Relations, 1996. 405-414
- 10 Landrum, Kauffman. Behavioral approaches to classroom management. Handbook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Research, Practice,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2006. 47-71
- 11 耿潇逸. 中小学惩罚式课堂纪律的反思. 教学与管理, 2015, 24: 68-71
- 12 Weiner B. Social Motivation, Justice, and the Moral Emotions: An Attributional Approach, 2006
- 13 Hyman IA, Perone DC. The other side of school violence: Educator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hat may contribute to student misbehavior.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1998, 36(1): 7-27
- 14 George HP, Kincaid D, Pollard-Sage J. Primary-tier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s. Handbook of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2009. 375-394
- 15 Alberto P.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for Teachers(7th ed). Upper Saddle River, 2006
- 16 McIntosh K, Frank JL, Spaulding SA. Establishing research-based trajectories of office discipline referrals for individual students.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2010, 39(3): 380
- 17 Osher D, Bear GG, Sprague JR, et al. How Can We Improve School Discipline?.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010, 39(1): 48-58
- 18 Bear GG. The positive in positive models of discipline.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Schools, 2009. 305-321
- 19 吴际. 综合视野下的社会情感学习与心理健康教育.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17, 28: 4-6
- 20 Durlak JA, Weissberg RP, Dymnicki AB, et al. The impact of enhancing students'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A meta-analysis of school-based universal interventions. Child Development, 2011, 82(1): 405-432
- 21 Bear GG, Cavalier AR, Manning MA. Developing Self-discipline and Preventing and Correcting Misbehavior, 2005
- 22 曾维芳. 以学生为中心的有效课堂管理策略. 文学教育(下), 2015, 1: 79-82
- 23 宫红霞. 论我国中学课堂纪律的重建. 广西师范大学, 2006
- 24 单亦亮, 徐亚垚. 新课程观下促进自我控制的课堂纪律研究. 中国教育学刊, 2016, 11: 91-95
- 25 王洪玲, 姜忠艳. 谈课堂纪律问题的复杂性. 现代中小学教育, 2006, 7: 24-26
- 26 魏亚琴. 小学健康课堂的构建.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 27 Bear GG, Yang C, Mantz L, et al. Delaware School Climate Surveys Technical Manual. University of Delaware, 2011
- 28 谢家树, 吕永晓, 马坤, 等. 特拉华校园氛围量表(学生卷)中文版信、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2): 250-253
- 29 谢家树, 覃凤荣. 特拉华学生卷入度量表(学生卷)中文版修订.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27): 277-281
- 30 车伟艳. 有效课堂管理的范围、要素及策略. 教学与管理, 2015, 4: 4-7

(收稿日期:2018-12-09)

(上接第627页)

- 43 Pennycook G, Cheyne JA, Seli P, et al. Analytic cognitive style predicts religious and paranormal belief. Cognition, 2012, 123(3): 335-346
- 44 Swami V, Voracek M, Stieger S, et al. Analytic thinking reduces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Cognition, 2014, 133(3): 572-585
- 45 林国凤, 耿靖宇, 高峰强, 等. 大学生依恋回避与抑郁: 复合中介模型的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 26(1): 82-85
- 46 van Prooijen JW, De Vries RE. Organizational Conspiracy Beliefs: Implications for Leadership Styles and Employee Outcomes. Journal of Business & Psychology, 2016, 31(4): 479-491
- 47 van Prooijen JW. Procedural justice as autonomy regul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9, 96(6): 1166-1180

(收稿日期:2018-08-13)